

# 理解现代性的三个途径

赵联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要]当前中国学术界对现代性概念存在着不同理解。这些理解上的差异主要来自术语学和学科习惯。从术语翻译的习惯来讲,现代性应该被理解为人们的心态特征;从学科角度观察,应明确区分认知传统下和审美传统下现代性的不同含义;从社会学的历史出发,现代性应被理解为17世纪断裂后的社会特性。可见,对现代性的理解直接影响到我们对后现代性的界定。

[关键词]现代性;后现代性;术语学

[作者简介]赵联飞(1972—),男,重庆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社会学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2)06-0240-05 [收稿日期]2012-09-07

自改革开放后社会学在中国恢复以来,关于现代性问题的讨论逐步深入展开。从1980年代的现代化话语到1990年代末的自觉理论梳理,现代性概念的轮廓日益清晰。与此同时,现代性问题的复杂性也日益凸显。然而,关于什么是现代性这一问题至今尚无定论。从有关研究文献来看,国内外研究者对现代性的理解和表述异常丰富,既涉及不同学者术语使用上的偏好,也涉及不同学科对现代性思考角度的差异,同时还涉及对这一概念内涵的实质性认定。

## 一、从术语学意义上理解

何谓现代性?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为一个术语学问题。从词源角度来看,早在5世纪,西方就开始使用现代一词。据考证,该词来源于拉丁文 modernus;一般认为在英语中从17世纪开始得到运用;而在法语中则于1849年首次出现于夏布多里昂的《墓中回忆录》;波德莱尔在1863年发表的论康斯坦丁·居伊的论文中首次明确地对现代性作了表述<sup>[1] [P55]</sup>。贡巴尼翁指出“‘现代、现代性、现代主义’这些词在法语、英语、德语中并不具有统一意义。它们并不指向清楚、明晰的观念,也不指向封闭性的概念。”<sup>[2] [P22]</sup>其实,在同一种语言中,这些词语的内涵也不尽明晰。这里从两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一是现代性与现代、现代化、现代主义等相近概念的区别;二是现代性究竟是一个对特定历史的

描述概念,还是一个与“古代”或“传统”相对应的概念。

刘小枫对现代化、现代主义及现代性作了区分:“现代现象是人类有‘史’以来在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知识理念体系和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相应的文化制度方面发生的全方位秩序转型……从现代现象的结构层面看,现代事件发生于上述三个相互关联、又有所区别的结构性位置。我用三个不同的术语来指称它们:现代化题域——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现代主义题域——知识和感受之理念体系的变调和重构。现代性题域——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文化制度之质态和形态变化。”<sup>[3] [P3]</sup> 谢立中对现代性、现代主义、现代、现代化这四个概念进行讨论,并引用费瑟斯通的观点指出,西方文献的大体倾向是将“现代”看作是一个比“现代性”、“现代主义”和“现代化”更为一般的概念或术语,而将“现代性”界定为“现代时期”或“现代状况”,将“现代主义”界定为一种社会思潮或文化运动,将“现代化”界定为实现“现代性”的一种过程<sup>[4]</sup>。此外,现代性有时还与现代主义、现代等词互相换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则较为复杂。卡林内斯库指出,虽然现代性一词从17世纪开始在英语中流行,但由于法国新古典主义传统关心语言的纯粹性和规范性,直到19世纪前半期,现代性一词才开始被使用。在这种情况下,现代主义“既用在宗教意义上,也用在广义的艺术上”<sup>[1] [P338]</sup>。于是,19世纪以前文学艺术中的

现代主义风格一度与文学艺术的现代性相等同。在中文语境下,学者们在使用相关概念时,其指向也不尽一致。例如,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的名著《人的现代化素质探索》,其英文原版名为 Exploring Individual Modernity,在1995年翻译成中文时,译者使用了“现代化”一词与 modernity 相对应。然而,细读全书可以发现,作者所谈论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刘小枫、谢立中等学者界定为现代性的东西。在笔者看来,刘小枫、谢立中等学者的理解更加符合英文构词法的一般规则和逻辑,也较为符合英译汉的对应规则。

此外,很多学者指出了现代性这一概念在所表征的时间维度上的差异。这个问题其实不仅仅是现代性的时间维度差异问题,其与现代性的发生过程和实质认定问题均紧密相关。按照谢立中的分析,广义上的现代性指“新奇性、飞逝性”,而狭义上的现代性则指“17世纪以来的新文明”<sup>[4]</sup>。前者的定义实际上来源于波德莱尔的著名论断——“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这实际上表明,所谓现代性是一个相对概念;而后者则可被认为与吉登斯的主张有关——“现代性指社会生活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sup>[1] [P1]</sup>。实际上,许多西方学者考察了有关现代性的概念发展史。这里列出哈贝马斯和尧斯的有关观点,与吉登斯明确不同,也与波德莱尔有所差别。哈贝马斯在1981年的《现代性对后现代性》中提出“一些论者把‘现代性’这一概念只限于文艺复兴。从历史角度看,这种限定显然过于狭隘了。比如,12世纪查理大帝时代,人们就认为是现代了,17世纪后期法国著名的‘古今之争’时期,人们也持同样的看法。”<sup>[2] [P138]</sup>尧斯则更加全面地回顾了西方自5世纪以来对现代概念的应用,指出在罗马时代、中世纪经院时代就存在着关于现代的观点<sup>[2] [P149]</sup>。显然,从这种理解出发,我们可以认为,现代性在启蒙运动之前即有一个历史的谱系;而按照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的描述,现代性则意味着断裂后的历史,是工业革命后首先出现于17世纪欧洲社会的一种突生性质。

## 二、从学科习惯上来理解

如果对不同学科关于现代性的讨论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各个学科乃至各学科内部对现代性的理解不尽一致,并较清晰地体现在对现代性内涵和特征的界定上,同时也体现在对现代性的历史发生过程的判断上。

### 1. 哲学意义上的现代性

从哲学角度来看,现代性与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及道德、宗教、政治哲学紧密相关,哲学家们往往沿着康德、黑格尔现代性研究的传统去探讨现代性的哲学本质,并将其与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有研究者指出,从哲学角度来看,现代性态度的核心是理性和主体性,其根本价值则是自由,并表现为世俗化和“去魅”的过程<sup>[4]</sup>。在哲学家中,康德和福柯先后写下了题为《什么是启蒙》的文章。康德提出,启蒙的关键在于两点:一是运用理性的勇气;二是运用理性的自由。而福柯则认为,现代性是“一种态度”,并且,“所谓态度,我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由特定人民所作的志愿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就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在一个相同的时刻,这种方式标志出一种归属的关系并把它表述为一种任务”<sup>[5] [P430]</sup>。这种态度在启蒙时代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哲学气质,即批判的精神。

在康德之前,已经有不少哲学家涉及了现代性的种种主题。康德在纯粹的哲学层面上首次系统地论述了人的主体性、理性以及科学和道德的原则问题,这些论述是以思维和行为规则的“先验性”为特征的,表达了他关于理性的态度。在康德之后,黑格尔、韦伯、哈贝马斯、福柯等思想家进一步扩展了康德所提出的论题。从哲学角度来说,黑格尔对现代性概念的最重要的贡献是进一步明确了主体性在现代性哲学分析中的地位,指出所谓自我关系,就是将自身作为客体的主体关系。此外,他还提出了市民社会概念,将其列入三大伦理范围之一,并从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范畴角度来把握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认为市民社会是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阶段,其存在必须以国家为前提。在韦伯那里,理性化是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这一特征在文化领域内表现为宗教世界观图景消除后的世俗化过程,在社会领域内表现为理性经济行为的蔓延以及科层制在各种组织的日益广泛应用,而个体的理性化则源自于新教伦理影响下所形成的天职观念在日常生活中发挥指导作用的过程。

哈贝马斯则是一个对康德以来的现代性思想进行全面继承和发展的人物,也是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与各种后现代理论就现代性问题进行理论争辩的重要人物。从梳理现代性概念内涵的角度出发,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分析的最重要的贡献应包括两个核心内容:一是他在波普尔关于三个世界的观点的基础上所作的三种世界的区分,即“客观世界”、“社会

世界”和“主观世界”,并进一步把贾维在波普尔关于世界区分的基础上所形成的行动分析理论作为出发点,提出了规范调节行为、戏剧行为和交往行为的区分<sup>[6] (P75-93)</sup>。这一区分修正了韦伯将理性局限在工具理性层面的思想,其意义在于明确提出了现代性具有多重内涵,即所谓社会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的区别,并为他进一步提出沟通行动理论奠定了基础。其第二个贡献是,提出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一书中,哈贝马斯指出,在韦伯之后,一些学者提出了现代化理论,这种理论从表面上看起来反驳了后现代主义者关于“现代性终结”的观点,但实际上却使得现代化过程与现代性从西欧起源的历史分离开来。他强调,现代性内部存在着自我更新的因子,从而使现代性在各种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下获得了学理上的支撑。

## 2. 美学意义上的现代性

在美学和文学艺术研究等领域,对现代性的理解有着另一番复杂景象。卡林内斯库指出“美学现代性应该被理解成为一个包含三重辩证对立的危机观点——对立传统;对立与资产阶级文明(即其理性、功利、进步理想)的现代性;对立于它自身,因为它把自己设想为一种新的传统或权威。”<sup>[1] (P16-17)</sup>这一论断实际上是对美学意义上的现代性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发展历史的高度概括,并指出了美学现代性内在的基本取向。

对立传统,或者说审美价值的现代性品格主要是指在启蒙运动早期对人文主义精神的继承及其与基督教美学的对立。基督教神学美学坚持扬弃肉身感受,而人文主义则将美还原为日常生活,启蒙运动对主体的强调为美学推崇感性奠定了其在哲学上的合法性基础。有研究者指出,在19世纪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以后,感性彻底压倒了理性,美带给人们的不再是灵魂的升华,而是生命过程的纯粹快乐<sup>[7] (P146-150)</sup>。

美学现代性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审美趣味在现代性心性结构中的扩张,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一方面源于哲学上主体意识的高扬。当宗教性的世界图景消失后,世俗化的世界成为人们生存的意义所在,由此带来的是此岸感的高涨,亦即主体性的生存感。另一方面,正如卡林内斯库所指出的,西方历史上的现代性包含着两种截然对立的成分:一种是资产阶级的现代性,具体表现为资产阶级早期的那些杰出传统,如崇尚科学和理性及抽象框架中的自由理念;另一种则是导致先锋派产生的现代性,

这种现代性始于浪漫主义,并一直作为资产阶级标准的对立面出现,公开拒斥资产阶级的现代性<sup>[1] (P148)</sup>。在卡林内斯库看来,这种导致先锋派产生的现代性一直将审美作为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武器。

## 3. 社会学意义上的现代性

在社会学中,对现代性的理解显得更加复杂多样。这种复杂性来自于多个方面:首先是因为社会学有许多分支学科,其次与不同学者的研究兴趣、接近问题的策略紧密相关,有时还不得不归之于他们所处的时代。笔者试图将这些关于现代性的研究按照其着眼点的不同归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从制度角度入手的观点。这一类研究强调制度变迁在现代性分析中的中心地位,同时把现代性视为经历程度不同的变迁过程后的社会所具备的特征。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与哈贝马斯所言的“社会现代性”相呼应。下面这段话很好地体现了这一部分学者对现代性的理解图式:

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现代性总是和现代化过程密不可分,工业化、城市化、科层化、世俗化、市民社会、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等历史过程,就是现代化的种种指标。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涉及以下四种历史过程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的过程。世俗政治权力的确立和合法化,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工业化过程,传统社会秩序的衰落和社会的分化与分工,以及宗教的衰微与世俗文化的兴起,这些深刻地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形成<sup>[7] (P2-4)</sup>。

这段话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指出了现代性过程的内在复杂性,但无意之间也暴露了一个问题:对现代化的定义已经与工业化、城市化、科层制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意味着,由此种路径出发理解的现代性是所谓“狭义”上的现代性。斯图加特·霍尔指出,可以从四个维度对传统和现代进行区分:一是权力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二是有没有建立在货币基础上之上的经济以及受自由市场制约的大规模商品生产和消费;三是传统社会中存在的固定分层被动态的社会分层所取代;四是宗教世界观的衰亡,个人工具理性的流行<sup>[2] (P43)</sup>。很显然,持类似观点的学者更多地是将现代性与工业革命以来的那种典型社会变迁历程相关联,并由此进行“传统”和“现代”的比较。这种思想可以在经典的西方社会学思想家那里找到痕迹,滕尼斯关于军事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区分,涂尔干关于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辨析,韦伯关

于理性化过程的分析,以及帕森斯关于模式变量的分析,都与这种观点有类似之处。回顾刘小枫关于现代现象结构的分析,可以认为,这种分析正是在“政治—经济”制度层面上对现代现象的透视,其关注的焦点在于宏大的历史进程及社会层面上的制度变迁。而所谓现代性,就是具备这样一些制度特征的社会所具有的特性。

另一种观点是从个体的态度和主观感受来分析现代性问题。伯曼的这段话明确地表明了这种对现代性的理解途径的特点:“今天,全世界的男女们都在分享着一种重要的经验——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人、生活中的种种可能与危险的体验。我将把这些体验总称为‘现代性’。”<sup>[8] (P15)</sup> 虽然伯曼是在1980年代提出这一观点的,但这种关于现代性的分析思路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初,舍勒和齐美尔就开创了研究个体心性结构的传统。舍勒深受现象学的影响,提出“生活世界的现代性问题不能仅仅从经济结构来把握,也必须通过人的体验结构来把握;现代现象是一场‘总体转变’,包括社会制度和精神气质,现代性是深层的‘价值秩序’的位移和重构,现代的精神气质体现了一种现代型的价值秩序的成形,改变了生活中的具体的价值评价”<sup>[3] (P16)</sup>。至于齐美尔,一般被认为是文化社会学研究的始作俑者<sup>[9] (P20)</sup>。19世纪末,齐美尔开始关注对城市生活和货币的研究,在以《货币哲学》和《大都会和精神生活》为代表的作品中,他详尽地探讨了货币、消费等现象的文化意义,对都市人群的心理作了深入分析。弗里斯比在对齐美尔等学者的研究进行比较后指出,在齐美尔看来,“现代性的本质是心理主义,是根据我们内在生活的反应(甚至当作一个内心世界)来体验和解释世界,是固定内容在易变的心灵成分中的消解,一切实质性的东西被心灵过滤掉,而心灵形式只不过是变动的形式而已”<sup>[10] (P62)</sup>。弗里斯比还指出,齐美尔以及后来的克拉考尔、本雅明,均是在波德莱尔所言现代性的意义上进行讨论,其视角十分相似,“他们的现代性分析的共同点,是经常无意识地接受现代性概念创始人波德莱尔所刻画的特征,即‘过渡的、短暂易逝的、偶然的’”<sup>[10] (P5)</sup>。在这种视角的观照下,分析者往往从生活中的细微之处出发,分析其背后所蕴涵的结构上的意义。如本雅明拒斥所谓的整体景观,坚持所有的现象都是万花筒中的碎片。在1960年代以后,鲍德里亚关于消费的一系列研究也正是建立在这种“碎片化”分析的传统之上。这种被称为“碎片化”的分析策略,按照伯曼的观点,可以追溯到马克思从商品角度

对资本主义所作的分析,因为正是马克思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sup>[8] (P22-23)</sup>

### 三、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差异来理解

在讨论现代性问题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另一个重要概念——后现代性。因此,本文将对后现代性的相关概念加以梳理,并与现代性概念结合起来,从而厘清二者在学理上的关系。

自1960年代以来,关于后现代问题的讨论广泛地存在于多个学科中。与现代性概念一样,这个问题实际上仍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术语学问题;二是对后现代性内涵的理解问题。

后现代性概念也有着较悠久的历史渊源,同时类似于现代性概念也存在着后现代性、后现代化、后现代等术语的区别。不过,相当一部分学者在承认后现代现象存在的同时,并不认为存在着所谓“后现代性”。前文所提及的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作为“一项未竟事业”的讨论明确反对“现代性已经终结”的观点,不仅如此,他还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一书中系统地回顾了自黑格尔以来一直到福柯关于现代性的讨论,并一一提出了批判,其最终的结论是必须迈向以主体间性为基础的交往行动理性。而按照吉登斯等人的观点,所谓的后现代社会不过是现代社会的晚期,或者是高度发展的现代性。在谈到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等概念时,吉登斯指出:“如果说我们正在进入后现代的阶段,那就意味着,社会的发展的轨迹正在引导我们日益脱离现代性制度,并向一种新的不同的社会秩序转变。后现代主义,如果以一种有说服力的形式存在的话,可以说是对于这一转变的一种认识,但并不表明后现代性是存在的。”<sup>[1] (P40)</sup> 吉登斯还提出了“自反性”现代化这一理论来分析这一社会秩序转变过程,持类似观点的代表人物还包括乌尔里希·贝克、斯科特·拉什等。在贝克看来,自反性首先是指“自我对抗”,而非反思。“‘自反性现代化’指创造地(自我)毁灭整整一个时代——工业社会时代——的可能性”,在这种可能性的观照下,“工业社会变化悄无声息地在未经计划的情况下紧随着正常的、自主的现代化过程而来,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完好无损,这种社会变化意味着现代性的激进化,这种激进化打破了工业社会的前提并开辟了通向另一种现代性的道路”<sup>[1] (P6)</sup>。拉什则更为清晰地表述了对“自反性现代化”的理解,提出了三个理解角度:一是“自反性现代化是关于相对结构的一种社会行动者或‘能动

作用’日益增长的权力的理论”；二是关于自反性现代性与日常生活的紧密关联，指出有必要清晰区分自波德莱尔至本雅明、阿多诺所形成的对现代性的美学理解与自康德到杜尔凯姆、哈贝马斯所形成的认知传统；三是自反性现代化理论是一种个性化的强大纲领<sup>[1] (P140)</sup>。

从以上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讨论可以看出，是否存在后现代社会这一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对现代性概念的理解。拉什有关自反性现代化的理解击中了问题的要害，指出了在现代性理解历史上的两种重要传统，这实际上有助于我们去发现各种理论之间的联系。而哈贝马斯、吉登斯等人之所以认为不存在后现代性，正是因为他们是从认知分析的传统去探究这一问题的。由于黑格尔已经提出了现代性自我关系的对象化，因此，在现代性内部就存在着如哈贝马斯所言的“自我更新的因子”，任何对现代性的批判都将被看作是这种因子发生作用的结果，从而也就无所谓后现代性。而对于美学传统来说，其历来偏重于从反抗角度来理解现代性（至少认为现代性内部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内容），从这种角度去观察现代性，会看到其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点。所谓的后现代性作为一种混淆生活和艺术界限的倾向，与早期启蒙阶段强调艺术与大众情趣的分野的倾向截然不同，由此可以把这种新的倾向称为后现代性。

虽然对现代性概念的描述如此之多，但有一点十分清楚：术语学的考证只是为了帮助我们清除阅读的障碍，而学科间的不同阐释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现代性复杂内涵的理解。从以上关于现代性概念的区分中也可以发现，不同学科关于现代性的理解

之间实际上也存在着深刻联系。就哲学和美学而言，二者可以在人的主体性和日常生活的此岸性上取得共鸣；而社会学关于日常生活的分析又与哲学的现象学转向不无关联。如果从社会学研究的传统出发，现代性更多地与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紧密关联，毕竟社会学在1860年代发轫于欧洲，从一开始，其所关注的问题就是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后的社会现实。

### [参 考 文 献]

- [1] 马泰·卡林内斯库. 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2] 周宪. 文化现代性精粹读本[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 [3] 刘小枫.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8.
- [4] 谢立中. “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5).
- [5]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 [6] 陈嘉明.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 [7] 杜小真. 福柯集[M].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3.
- [8] 弗兰克·梯利. 西方哲学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9] 尤尔根·哈贝马斯.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 [10] 尤尔根·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 第1卷[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 Three Approaches to Modernity

ZHAO Lian-fei

(Research Institute of Sociology,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approaches to moder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modernity should be thought as the mind-set of people in modern socie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ciplinary difference, we should be cautious 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gnitive modernity and the aesthetic modernity; and from the history of sociology, modernity associates to the history after the 17th century. The understanding of modernity influence the meaning of post-modernity.

**Key Words:**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责任编辑、校对: 何石彬]